

丝绸之路于阗文化与唐代长安体育的繁荣

刘 阳, 刘知和, 胡芳芳, 刘 青

(陕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 ▶ 盛唐时期, 于阗作为丝绸之路的南道重镇, 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文章以丝绸之路于阗文化与唐代长安体育发展与交流为线索, 重点分析于阗体育文化地域特征, 探讨于阗文化在唐代体育文化多元发展中的价值。研究认为, 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 于阗文化对唐代民间俗乐、乐舞等文化的繁荣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唐代长安的民间与宫廷的娱乐活动, 对中华体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研究对于推进当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体育文化交流具有历史借鉴价值。

关键词 ▶ 丝绸之路; 于阗文化; 唐代体育; 南道文化

DOI: 10.16730/j.cnki.61-1019/g8.2024.11.002

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传播在促进古代体育文化交流和发

展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对盛唐时期丝绸之路体育传播的交流进行研究, 需要从地域文化视角对丝绸之路沿途各地的体育文化交流活动进行更为深入而详细的探索。只有从部分延伸到整体, 所得到的研究成果才能更为完整地展现历史的原貌^[1]。随着丝绸之路相关领域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增加, 有相当一部分研究问题都涉及丝绸之路南、北道文化的差异。本研究对丝绸之路南道重镇于阗的史料记载进行了阐述, 并对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唐长安文化和南道文化交流的特征进行分析。通过于阗与唐长安体育交流史的分析和探索, 有助于更好地还原古丝绸之路体育文化交流的历史原貌。

1 丝绸之路南北道与于阗文化

1.1 丝绸之路的南北道地域文化差异

古丝绸之路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丝绸之路南北道的畅通与交融, 为唐代包括体育在内的多种文化中西方因素的增加提供了依据。作为中华体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 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文化体育活动的开展, 是研究中国体育文化的重要史料。现有的研究成果中, 通常情况下是按照南道和北道来对古丝路进行划分并

以此为依据来展开研究。《汉书·西域传》对这种南北道的划分给出了最早的记录: “出玉门而分两道, 南道自鄯善西至莎车, 过葱岭而抵安息; 北道则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 波河终至疏勒”^[2]。南北道文化、艺术风格差异显著。南道一路经印度到达罗马和阿拉伯王国, 有明显的犍陀罗风格, 是古代希腊艺术与印度艺术结合的产物, 是中西文化结合的最好例证^[3]。公元前399年, 65岁的东晋和尚法显大体上是沿这条路线越过风雪弥漫的帕米尔高原, 其风格受宗教文化及印度文化影响被称为“古典的”“印度的”。北道直达罗马和各国, 张骞和高僧玄奘大体是沿北道而完成整个旅行的, 其风格有明显的波斯特征, 因而被称为“波斯的”。

1.2 绿洲通道与于阗文化

丝绸之路是肩负商贸与文化交流双重使命的主要通道。毛主席诗词中的名句“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4]中提到的于阗是古代西域王国, 因歌舞音乐而闻名, 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部, 曾经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大国, 大致包括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墨玉和洛浦等地。于阗人擅长歌舞, 其最著名的便是于阗乐舞。于阗正是凭借着丝绸之路所提供的商业交往和文化交流而逐步成为东西方交流的节点, 绿洲上的诸多明珠城郭成为东西方文化、经济相交汇的重要地点。于阗绿洲承载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任, 唐代

作者简介: 刘阳, 男, 教授, 研究方向: 体育历史与文化; 刘知和, 男, 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体育教育; 胡芳芳, 女, 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体育教育; 刘青, 女, 讲师, 研究方向: 体育文化。

的于阗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突厥文化、唐文化、吐蕃文化都有所体现,这对于于阗文化的出现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丝绸之路南道中的粟特文化、印度文化、唐文化在此地不断交融和汇聚。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看,以大成佛教为主的佛教在当地的传播较为广泛,但是包括祆教在内的其他信仰体系在当地也有所发现。从文化传播角度来看,当地的艺术传播中“西传”和“东渐”是相互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双向性传播特征。在唐代,于阗文化在多种文化的共同影响之下,增添了磅礴大气的特征,不断融合东西方文化并逐渐走向成熟和完整^[5]。

2 于阗文化特征与唐代的体育文化交流

2.1 唐代长安体育的特质与历史价值

唐代长安体育正是在丝绸之路的多文化背景中自由地发展与传播,具有开放性、创造性和多样性的文化特征。丝绸之路凭借其前所未有的时间和空间的广泛性,将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推向了全新阶段,也使得盛唐时期的我国传统民族体育文化得以逐步定型^[6]。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之下,唐朝体育文化真正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阶级和地域的限制,形成了中原和少数民族之间、民间与宫廷之间的文化互动;同时,体育的娱乐形式也得到了均衡发展,从宫廷至市井、从儿童至老人,体育活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唐代体育文化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中华本土体育文化始终是主流,通过丝绸之路而涌入的外国体育文化,为中华体育文化繁荣注入了新的力量。

2.2 于阗体育的宗教文化特征

于阗文化和宗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作为重要的大乘佛教圣地,于阗文化充分体现了大乘佛教在文化领域内的作用。以于阗国王为首,李氏国王信奉佛教,并与中原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形成了文化的交融。尤其是医学中的佛教色彩更是成为当时于阗社会的重要特色。印度佛教在生命吠陀的宣传中有着大量的应用,这种改造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传统大乘佛教的限制而演变成为一种新的地方文化习俗。在佛教传入西域地区之前,于阗居民所信奉的为各种自然神,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意义的包括反映了大地崇拜的“地乳王”等,且已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民间祭祀行为和祭祀习俗。而在佛教传入于阗地区之后,多种佛教仪式也随着佛教信奉者数量的增加而被当地自然神体系所吸纳。于阗的佛教文化中,祈祷、诵经等常规宗教仪式是非常常见的,甚至融入了于阗人的日常生活中,而民间信仰仪式中,模

拟、禁忌、巫术以及宴饮等都是较为常见的形式,情绪色彩是其重要特征。

2.3 唐代与于阗文化的多元融合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济与文化交流之路,更是一条民族融合之路,是古代中国得以与西方文明交融交汇的合璧之路,各民族通过音乐、舞蹈交融,共听、共舞、共享这份文化交流盛宴。隋唐时期,于阗国归附中原王朝,唐朝设立了都督府,封于阗王尉迟伏阁雄为都督,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并且经常遣使进贡,于阗国的国王领安西节度副使名号,标志着于阗国隶属于唐朝的统治。作为唐王朝大一统之后的安西四镇之一,于阗地区在中央政权的管理之下,有大量汉族人涌入其中,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和当地本土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尤其是当时定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的设立,更是将于阗地区的制度文化推向了顶峰。在政治交流中,于阗王遣子入侍唐代宫廷,如史料记载:“尉迟屈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十三年,又遣子入侍”^[7],这为西域各国与唐朝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皇室之间的联姻结盟也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外交手段,如唐玄宗天宝年间,于阗国王尉迟胜出使唐朝,玄宗将宗室之女嫁给他,并授予大将军的职务。唐代开明的政治制度促进了多民族的文化交往、融合,成就了唐代体育文化的多元繁荣,为唐代中华体育文化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做出了贡献。

3 于阗文化对唐代体育文化的影响

3.1 于阗文化对唐代宫廷乐舞的影响

唐代是西域音乐的鼎盛时期,以于阗和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音乐也对唐朝宫廷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宫廷音乐多为胡音^[8]。作为西域诸国受佛教影响最大的地区,于阗音乐中,佛教音乐占有重要地位。实际上,于阗地区本身对歌舞就非常推崇,而融入了佛教音乐和佛教文化后,其内容和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唐代,于阗乐舞风靡中原,于阗乐在宫廷广泛演奏,优美欢快的旋律常常赢得赞许。唐朝国乐十部乐中,就收入了于阗乐。在和田地区博物馆中就有大量西域风格的陶塑作品,这些历史文物不仅和当时中原地区的艺术风格完全不同,也同样迥异于西方雕塑艺术。实际上,这些文物主要是于阗国向大唐所出口的艺术品,自身鲜明的地域特色为后人更好地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提供了载体。遗存的大量乐舞雕塑印证了《大唐西域记》记载的“国尚乐音,人好歌舞”^[9]。如图所示,图1为1984年在洛浦县恰尔巴格乡西北处的苏尔木遗址出土的约公元7世纪的

伎乐陶片，陶片类似陶质器皿的残片，高3.5厘米，宽3.7厘米，质地为红土烧陶。陶片上的伎乐像为浮雕，外有一个联珠纹的圆圈为装饰。伎乐怀抱五弦琵琶，左手握琴颈，右手拨琴弦。图2为1984年位于和田市拉斯奎镇巴勒玛斯村遗址出土的约公元7世纪的伎乐陶片，陶片类似一个破碎器皿的残片，由红土烧制，高10.5厘米，宽8.5厘米。上端浮塑栏台、宫廷建筑柱头和一个怀抱弓形箜篌的伎乐。从这些残破的陶塑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于阗乐舞形式多样，广为流传^[7]。同时，于阗还独创了佛教乐舞，著名的《西域佛曲》整整影响了中原曲艺文化八个世纪，众所周知的唐朝宫廷名曲《霓裳羽衣曲》，也是经过一个精通乐理的于阗乐工改编并演奏才得以流传。



图1 和田洛浦苏尔木伎乐陶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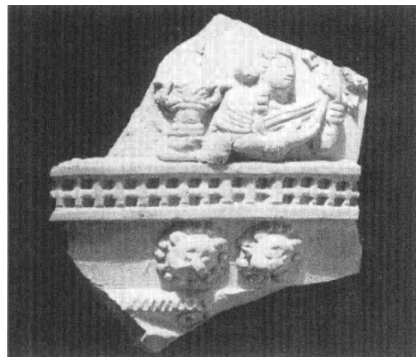


图2 和田拉斯奎镇巴勒玛斯村伎乐陶片

3.2 于阗文化对唐代民间舞蹈的影响

于阗文化对唐代舞蹈文化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并在唐朝民间的多个方面有所体现，不仅仅局限于宫廷乐舞。高僧法显在于阗地区就曾经重点强调了该地区民间法乐的盛行之态；张骞在从西域回到长安的时候，所携带的《摩柯兜勒》虽然是佛乐，但也在唐长安城广为流传。实际上，南道中心的于阗音乐与北道中心的龟兹音乐是唐代最为流行的西域音乐，分别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一为伊朗

一犍陀罗一于阗一中国，另一为印度一龟兹一中国^[10]。史料中对唐朝时期长安的于阗音乐大家进行了记录和歌颂，包括尉迟敬德、尉迟青在内出名的于阗歌舞大家，为唐朝和于阗地区的双向歌舞、音乐艺术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尉迟青等人是当时长安地区最为著名的演奏家，而尉迟璋则对包括鼓瑟在内的多种中原乐器非常熟练。通过对史料的研究可以发现，古代于阗地区的人民主要是羌人的后裔，因此可以认为于阗音乐的本质是西羌音乐，横笛是其核心乐器。而后塞种人大规模进入于阗之后，瞿萨旦那王朝建立，并开始大规模引入佛教音乐，犍陀罗音乐由此在于阗地区盛行，并传入唐长安。盛唐时期，唐长安的舞蹈进入了高度繁荣时期^[11]，实现了异质体育文化的本土化过程，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6]。

3.3 于阗文化对唐代节庆娱乐的影响

佛教在于阗地区大规模推广，绿洲人在佛教的影响之下，无论是节庆意识还是日常的生活习俗，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改变也体现在节庆祭祀上。佛祖行像仪式是当地最大的祭祀仪式，等同于全国性节日，每次约持续半个多月，《法显传》中有相关记录：“家家门前皆起小塔”^[12]。于阗地区最为著名的瞿摩帝寺就是典型的佛寺，最多时僧众超过三千人。实际上，于阗地区无论是在社会的统治阶级还是平民百姓，其信仰体系都出现过巨大的变化。虽然当时于阗地区的传统自然神系仍然对其民众的生活有着巨大而直接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佛教已经成为当地最为盛行的信仰体系，在当地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佛曲乐也同样取代了于阗地区的日常民间歌舞。而于阗当地历史资料所记载的“金银雕莹”技艺，也同样充分说明着当时佛教对于阗地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娱乐的影响。宗教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引领和制约着于阗的文化发展。4世纪末，法显和尚在描述于阗的时候曾经说过“国丰民乐，奉法为先，僧众逾万，众人供养”。玄奘取经过于阗时受到热情接待，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俗知礼义，人性温恭，好学典艺，博达技能”^[13]。玄奘在七世纪到达于阗时，当地已经有超过百所寺院，包括远道而来的外国僧侣，超过五千人。在《大唐西域记》所重点刻画和描绘的“举国僚庶，鼓乐饮饯”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这种攘解仪式实际上是通过宴饮的方式进行的^[14]。而在这里歌舞已经成为一种仪式、手段，起到愉悦神灵的作用。这一系列的佛教庆典及祭祀举措对促进唐长安体育文化的繁荣，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 结语

丝绸之路的开拓为唐代体育的勃兴、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而作为丝绸之路南道重镇的于阗与大唐文化的互融也直接影响了唐代体育的发展,恢宏的唐长安体育是多民

族文化交汇的成果,是世界体育史上的奇观。于阗文化在文化、经济等活动中对唐代体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将绿洲体育文化融入唐文化中,丰富了唐代体育内容,推进了唐代体育的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陈明.汉唐时期于阗的对外医药交流[J].历史研究,2008(4):17-39+190.
- [2] 仲高.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于阗文化[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37-40.
- [3] 金永安,黄厚明,陈云海.论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佛教造像艺术[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3(3):37-40.
- [4] 徐四海.毛泽东诗词鉴赏[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05.
- [5] 仲高.隋唐时期的于阗文化[J].西域研究,2001(1):81-88.
- [6] 许万林,曾玉华.丝绸之路陇右文化与唐代长安体育的繁荣[J].体育科学,2005,20(4):32-33.
- [7] 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775.
- [8] 王志艳.寻找失落的古文明[M].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2012.09:16.
- [9] 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M].季羡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1001.
- [10] 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乐制篇上卷)[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0:28.
- [11] 张少华.汉唐时期于阗地区的社会生活[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4,23(4):114-116.
- [12] 东晋沙门释法显.法显传校注[M].章巽,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11:12.
- [13] 刘维钧.西域史话(二)[M].新疆:新疆青年出版社,1985,07.
- [14]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33.